

包容性生态民主理论的新进展(下)

◎[英]塔基斯·福托鲍洛斯(Takis Fotopoulos)文

丁 晔译

[摘要]从主题上探讨包容性生态民主理论在过去 1997-2007 年间的新进展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与包容性民主相关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论述由包容性民主计划所阐发的全球化理论,以及它与左翼的非系统的全球化阐释方法的不同;第三部分在说明旧的反体系运动和新社会运动为什么日趋衰退或被吸纳进既存体系的同时,阐明包容性民主计划如何区别于其他激进的政治方案。包容性民主计划所设想的新型反体系运动,无论在总体目标还是具体手段上都与传统的反体系运动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而它转型战略的基本原则是:既然系统性的变革目标要求实现在制度和层面上与过去的断裂,就必须创建新的政治组织和致力于体系变革的新的全面的政治纲领,并同时在大规模民众层面上造就清晰的反体系意识。

[关键词]包容性民主;现代性;全球化;反体系运动;绿色左翼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1674-6848(2011)04-0115-14

[作者简介]塔基斯·福托鲍洛斯(Takis Fotopoulos),希腊籍英国自由政论作家,《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主编。

[译者简介]丁晔(1983-),女,天津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0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社会运动与社会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研究。(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西方绿色左翼政治思潮研究”阶段性成果(09YJA710046)。

Title: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on the Inclusive Ecological Democracy Project (Part 2)

Author: Takis Fotopoulos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esent briefly the new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on the ID project since ten years ago. The first part investigates the theoretical issues in TID. The second part presents the theory on globalization developed by the ID project and delineates it from the usual non-systemic globalization approaches of the Left. Finally, the third part attempts, on the one hand, to show why according to the ID approach both the old antisystemic movements (Marxism, anarchism) as well as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Green, feminism, etc.) are either in a stage of decline or simply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System and, on the other, to briefly delineate ID from other radical projects.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ID transitional strategy is that, as systemic change requires a rupture with the past which extends to both the institutional and the cultural level, such a rupture is only possibl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a new comprehensive political program for systemic change that will create a clear anti-systemic consciousness at a massive scale.

Key words: inclusive democracy; modernity; globalization; antisystemic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greenleft

三、反体系运动及其跨国策略

(一)反体系运动衰落的原因

1.传统反体系运动的性质

包容性民主方法对于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是它对反体系和改良主义运动之间的明确区分,即主要基于二者的目标,而不是它们所使用的方法。由于反体系运动旨在以新的制度和价值观取代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相应的价值观,而改良主义运动的目标则只是改进现存制度,所以上述区分明显不同于通常人们对于改良主义和革命运动的区分。改良主义的目标是缓慢而渐进的变革,而革命运动则是迅速而急剧的变革——这是按照实现社会变革的方法而不是目的进行的分类,目的本身也有可能是系统性的或改良主义的。

从历史上看,反体系运动比如无政府主义运动被划分为革命的一类,而不同于改良主义运动(比如社会民主运动)。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一种以体系的激进断裂为目标,但却使用非暴力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或者只有在向新社会转型中,当他们遭受了统治精英的攻击时才使用暴力手段的反体系运动。这正是包容性民主计划,其目标是通过建立可以重新将社会与经济、政治和自然相统一的新制度(以及相应的新价值观)来实现体系变革。

包容性民主方法所强调的重点是,为了解释19世纪和20世纪反体系运动的兴起及其在新自由主义现代性下的衰落,我们不仅要考察过去体系性变化的参数,还要考察这些运动本身的性质。传统的反体系运动采取的是单向度的“体系”概念,典型的就是将一种形式的权力视为其他所有形式权力的基础,这一事实在我们理解这些运动的性质中有着关键的意义,可以说,这些运动基本上是挑战某种特定形式的权力而不是权力本身。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将“体系”界定为“产生了一系列反体系运动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

(Arrighi, et al, 1989:1),并立足于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经济阶级和身份团体。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一体系的核心因素是生产方式——强调的是社会中经济权力的分配,并由此决定着或者至少为其他形式权力的分配提供了条件。

然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这种传统的反体系运动的终结,它曾经挑战作为其他权力形式基础的某一种权力形式。因为,问题已经不再是挑战某种形式的具体权力,而是挑战各种形式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即权力关系及其结构本身。正是传统反体系运动的衰落导致了对于新型的反体系运动的需要,而这正是包容性民主方法所强调的。

2.系统性参数的变化

毫无疑问,传统的反体系运动,无论是“旧的”(社会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还是“新的”(绿色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等)都处于严重衰落时期。尽管这些运动依然存在,但大部分已经失去了反体系的性质,而是以如下两种形式继续存在:一是明确的改良主义运动;二是自称的反体系运动,但却提不出任何明确的反体系主张,而只是围绕着改良主义的纲领,采用我们所熟知的左翼的“人民阵线”的形式。事实上,今天唯一的重要反体系力量是广义的反全球化运动中的某些流派,它们直接挑战现存“体系”,在改良主义的世界社会论坛(WSF)之外发挥作用。因而,问题是我们如何解释今天反体系运动事实上的衰落,以及我们如何评估新的反体系运动在21世纪的前景。

依据包容性民主方法,二次大战后现代性的系统性参数的变化可以用来解释现今反体系运动衰落的原因。这些变化既包括阶级结构(及其政治影响)的变化,也包括相应的意识形态危机以及后现代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兴起。

首先,阶级结构的变化有很重要的影响,尤

其是在北半球,当然也包括南半球。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化以及重大的技术变革,标志着市场经济进入后工业阶段这一事实,导致了在经济和非经济层面上的新的“阶级划分”。在经济层面上,这些发展的综合性结果是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极大地缩小了体力劳动阶级的规模。例如,在“七国集团”中(不包括加拿大),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制造业中的实际雇佣人口减少了1/3,这一情况对工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性和力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在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市场化过程中,在阶级光谱的每一边都有新的“阶级”产生:一端是新的社会底层,主要包括失业者和非活跃、未充分就业者(兼职人员、临时工等),他们处于贫困线以下;另一端是新的社会上层,包括上等及中上等阶级;在这两极之间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在北半球占据了人口的绝大部分。

这些系统性参数的变化必然不仅在经济层面,而且还在政治层面产生重大影响。在现代性时期到处存在的以性别、种族及其他“身份”为基础的社会区分,并没有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分化,但也显然并未消失,如今在新自由主义现代性时期变得更为突出。因此,等级制结构比如男权主义的家庭结构,并没有受到阶级兴起的任何影响,而是与阶级结构相互作用,并成为复制阶级结构的一个主要途径。同样地,在早期现代性阶段,民族国家的兴起为民族主义特色的冲突奠定了基础。最后,作为晚期现代性中的一个新进展,生态危机又添加了一个“超阶级”的问题:环境和生活质量问题。在解释新自由主义现代性下“新社会运动”(生态的、女性主义的、“身份认同”运动等)的兴起时,这些非经济层面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

其次,与上述结构性参数变化相伴随的是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人们质疑政治意识形态甚或“客观的”理性及理性本身,正如目前盛行的各种

形式的非理性主义所表明的那样。因此,尽管不能无视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积极方面,人们也许可以认为,后现代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已经成为构成任何反体系运动的最主要意识形态敌人的“两个祸根”。正如包容性民主所强调的,后现代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在解释新旧社会运动失去反体系本性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二)“旧的”反体系运动的衰落

反体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的产物。正是由现代性所预示的社会与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一个被政治和经济精英所控制的“体系”。那么,相应地,反体系的即反对精英对政治经济权力控制和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

各种形式的后现代主义反对任何一种关于“普世主义的”反体系计划。然而,对于替代性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未来而言,同时具有讥讽和困扰意味的是,在古典自由主义左翼的一些流派中也产生了类似的“实用主义”。战后至今,如果不算1968年“五月风暴”的话——它更多是受自由民主思想而不是经典的无政府思想所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自身分裂的和被边缘化的,而它最重要的部分近来甚至变为改良主义的。

实际上,有人主张,就试图建立一个理论化的反体系运动而言,唯一具有鲜明反体系特征的流派是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的社会生态学,最初称为邦联市镇主义或自由进步市镇主义,近来则称为自治公社主义。不过,这并不是美国或盎格鲁—萨克逊的主流观点。布克金曾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在晚年时,他逐渐脱离了无政府主义运动并断然拒绝诸如个人无政府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非理性主义等这些当今无政府主义的主流派别。同样表明这一点的,是如今盛行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及其分支“生活方式”的无政府主义、实用无政府主义等。最后,当代无政府主义中的另一个主要派别——直接行动,主

要体现在反全球化“运动”之中。尽管反全球化“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派别的确提出了反“体系的”要求,但它们尚未表现出推动新的民主运动形成的催化剂作用。

总之,就战后无政府主义的总体图景来说,其特点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意或难以通过对形势的具体分析和长期的目标与战略,开展一种理论化的运动。这一事实是目前无政府主义运动作为一种重要的反体系运动面临难堪的衰退境地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除非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力量能够克服它们现在的无能并改变不愿意为新的反体系民主运动发挥催化剂作用的态度,否则他们注定将会验证作为一种反体系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走向衰败的现存趋势。

(三)“新的”反体系运动的衰败

“旧的”反体系运动是自由主义现代性的产物,而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新的”社会运动(学生的、黑人的、女性主义的以及绿色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则是晚期或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结果。可以说,它们清晰地反映了笔者前面提到的系统性参数的变化,尤其是由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兴起所引起的阶级结构变化,以及相应的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兴起而出现的意识形态危机。

在新社会运动中,尤其是在学生、女性主义、黑人以及绿色运动中,确有几股“反体系”的流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社会运动达到了顶峰,然后走向衰退,倒不是在趋于消失的意义上,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变成了既存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因而遵循着类似世纪初劳工运动的轨迹。结果,到90年代,“新”社会运动已经演变为“身份认同政治”,即一种后现代政治,从关注整体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议题转向文化与认同关切。作为后现代政治的一种形式,认同政治表现出了对现代简约主义、普世主义和本质主义的鄙视。“新”社会运动的衰落催生了它们的产儿,即各种

非政府组织(NGOs),它们在新自由主义现代性条件下迅速扩散。然而,非政府组织不是社会运动,不仅因为它们是改良主义的,还因为它们大多是由政治和经济精英所资助的。

绿色运动的发展进程是上述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典型代表。在20世纪70年代初,绿色运动是一种新的、主要是反体系的运动,把生态危机视为“增长经济”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一旦激进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区分(在德国绿党中,这种区分表现为“fundis”与“realos”之间的差别),以后者完全战胜前者而告终,那么,绿色组织演变成为“常规的”议会政党或通常的改良主义组织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目前绿色运动中的主流并不挑战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制的基本框架,而是相反,或是采取巩固市民社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或是采用各种形式的环境主义的改良主义,或是强调改变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认为即使在现存制度框架下也能带来有益的变化。欧洲绿党在北约对南联盟人民的轰炸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Fotopoulos,1999a),以及它们现在卷入的跨国精英镇压反全球化运动^①的阴谋,都明确地表明了绿色运动作为一种反体系的自由力量的终结。

总之,在新自由主义现代性时期出现了如此大规模的政治思潮的右转,以至于现在很难说哪种运动是以反体系为特征的。同时,新社会运动内部的反体系派别已经萎缩,而一些仍然提出反体系要求的无政府主义流派不能(或不愿)构成一种运动。事实上,今天唯一重要的反体系流派只有在反全球化“运动”中才能找得到。

可是,反全球化“运动”如果从各个细节加以

^①在热那亚事件后,建立欧洲防暴警察以镇压反全球化抗议的建议,来自绿党发挥关键作用的德国政府。此外,在“9·11事件”后分享政府权力的欧洲绿党全面参与了作为反恐运动一部分的、压制欧洲公民自由的运动。

考察(Fotopoulos, 2001),既不是一种“运动”,也不是反体系的。简言之,它不是一种运动,因为其参与者的严重异质性,不允许形成统一的社会观点和价值观。它不是一种“反体系的”运动,因为其大多数参与者甚至并不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视为一种系统性现象,而是通常将其视为一种政策。因此,如果给精英施加适当压力的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全球化是可逆转的。由此我们可以预见,反全球化“运动”的未来或者是逐步消散,或者更可能的是转变为另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比如绿色运动),并逐渐被整合进现存“体系”之内。

但这并不否认如下事实,即在“运动”内部的确存在着反体系的因素,它们可以作为创造真正的反体系运动的催化剂。目前,这些反体系因素存在的问题是,它们对于未来社会缺乏清晰的愿景以及长期战略和短期纲领。简言之,在反全球化“运动”内部的反体系流派,或者由于受后现代主义对于“普世主义”方案强烈敌意的影响,或者因为他们对直接行动的偏爱,对于建立这样一种反体系运动并不感兴趣。他们模糊的假设是,通过直接行动和必然发生的国家压制,形势会被革命化,那时运动自身就会“自发地”产生对当时形势的正确分析以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清晰愿景和转型策略等。很明显,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历史已证明错误的社会变革观点。正如前文已经阐明的,在现实的社会转型发生之前,我们必须组织起有组织的反体系运动,大多数人都应培养起清晰的反体系意识,而这可以通过真实地生活于新型社会制度中来实现。

(四)有别于其他的包容性民主计划

1.自治方案与包容性民主

科内琉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的自治方案与包容性民主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正如笔者在他处表明的,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1999b)。事实上,包容性民主方案

代表着对现存传统和运动的综合与超越,它体现了古典民主和社会主义传统的综合,也涵盖了当代解放运动中的反体系流派。严格说来,包容性民主方案不是一个用以复制的“模式”,而是大致规定所有形式权力平等分配(即为了个人和集体的自治)的一些制度前提,并阐明基于这种制度框架的经济是如何以照顾到所有公民需求的方式运转的。

卡斯托里亚迪斯从未提出过一个与他晚年的自治方案相一致的经济体制新愿景,因而给人的印象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为早期的社会主义方案而构建的经济模式也适用于新的计划,而两个计划至少在工人在其中的管理作用方面有着明显不同。然而,尽管他接受了一个新的未来社会观念,却并没有放弃早期的社会主义工人自我管理的模式,而他晚年的自治计划所蕴含的公民民主自我管理和早期的社会主义计划蕴含的工人自我管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但正如笔者多次强调的,民主制下的人们应该作出所有影响着他们的决定,绝非仅仅作为生产者,而是作为公民,而后者的内涵要宽泛得多。事实上,晚年的卡斯托里亚迪斯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强调,在服务业中基于劳动团结和共同的生活创建工人委员会也许并不总是可能的,因而或许需要借助基于职业的协会或合作社。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今天大部分的劳动就业发生在服务业,那么,卡斯托里亚迪斯早期关于工人自我管理的建议不仅与他晚年的自治方案不相符合,而且已经完全过时。

如果将卡斯托里亚迪斯早期的关于未来社会的憧憬与包容性民主作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两个方面的重大区别。第一,卡氏的建议是以货币和真实的市场经济为前提的,而包容性民主继承的是自由进步主义的传统,是以无市场、无货币的经济为前提的。第二,在卡氏经济中,稀缺资源的分配是通过贯彻工人委员会决

议的计划和建立在非个性化货币基础上的真实市场来实施的,而包容性民主中资源的分配是通过贯彻公民大会决议的计划和建立在个性化货币基础上的虚拟市场来实现的。卡斯托里亚迪斯所建议的真实市场和货币经济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和矛盾,因为它无法避免真实的市场所带来的问题。他未能充分理解,能够在国际化经济中存在的真正市场只能是目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市场体系(Fotopoulos,1997:chapter 1),而且,正是市场与生产资料商品化的结合导致了现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不仅仅归结于后者(Fotopoulos,1997)。

此外,卡氏模型为了避免现实市场的动力学所必然带来的巨大不平等,不得不假设工资平等——结果,这种制度安排忽视了公民不同类型工作所带来的满意度严重差异。比如,卡氏的建议未能充分考虑到,在工资平等的经济中,矿工或水管工与演员、演说家或是电视记者相比在工作满意度上的差别。这种在工资平等掩盖下无视公民意愿的后果,是他所建议的经济体制根本不存在一个工作自主分配的机制。这是因为,在实践中平等工资或者意味着某种外部性力量的存在,或者是强制性的工种轮换,以便某些人可以被“劝服”去从事为了人类生存目的的工作——往往是艰苦和枯燥乏味的。相比之下,包容性民主计划致力于公民基本和非基本需要的满足,以及他们对所期望工作意愿的满足,因而不存在外部性强制和社会浪费(Fotopoulos,1997:chapter 6)。

然而,包容性民主计划与卡氏自治方案之间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哲学层面。正如笔者在他处表明的(2005:chapter 2),尽管两个计划都同意如下观点,即正是社会斗争的结果决定了每个历史时期现代性的性质和主要特征,但二者间的争议在于,对于斗争的最终结果来说,“客观的”与“主观的”因素相比谁是决定性的。在马克思主义者

看来,像技术变革这样的客观因素对结果有着重要影响,如果它们不(最终)决定人类历史本身的话。而对像卡斯托里亚迪斯这样的自治/民主传统的支持者而言,类似“社会想象”这样的主观因素在导致不确定结果中也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系的整个历史中,“客观”因素始终发挥着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假定的严格的经济“科学”意义上,而是在市场经济的“增长还是死亡”的动力的宽泛意义上。但正如卡斯托里亚迪斯正确地指出的,尽管这些客观因素可以解释尤其是经济精英的动机和行为,但随之而来的社会斗争的经济和社会最终结果总是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这就是为什么包容性民主计划坚持认为,正是同样重要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着历史的发展,并且总是导致并非确定性的后果。过于强调市场经济历史中“客观”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主观”因素的作用是错误的,反之亦然。可以这样说,卡斯托里亚迪斯许多表面上令人费解的、远离激进的理论或政治的立场,都可以通过他过分强调人类历史中想象因素的作用、低估“系统性”因素的作用来加以解释。比如他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不发展的原因、苏联与海湾战争等议题上的立场,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最后,卡斯托里亚迪斯甚至不愿意考虑与他所主张的自治社会相一致的伦理价值。因而,当他宣称“我们总是不得不在悲剧性的状况下生活,因为我们不总是知道善与恶的界限,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1997:122)时,理应会遭到布克金的强烈批评:“缺乏行为的理性客观标准的想象就会变成恶魔性的,正如当存在这种标准时,它会变成解放性的一样;因此,我们需要有见识的自发性和有见识的想象。”(1995:178)另一方面,在包容性民主理论看来,卡斯托里亚迪斯立场的问题是很容易走向一种后现代

的道德相对主义,或者布克金称之为的“道德主观化”。因而,尽管包容性民主的确拒绝任何“客观的”伦理,但它也确实致力于探求一种与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制度框架相一致的道德准则并提出了一些发展这种民主伦理的指南(Fotopoulos, 2002)。

总之,对于卡斯托里亚迪斯来说,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危机,存在着的只是一些“技术细节性的问题”,因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创造一种新的想象,从而把其他议题而不是生产与消费的扩大置于人类生活的中心”(1996)。因此,人们只要同意前文所述的包容性民主理论对于多重向度危机的详尽分析,就不必丝毫奇怪,为什么晚年的卡斯托里亚迪斯没有谈论革命性制度变化与相应的价值观变革相结合会导致一个新的革命性社会,而是采纳了一种首先致力于变革价值与社会想象、然后将自动导致制度变革的改良主义立场。这种立场是与绿色运动和左派中的改良主义观点相一致的,都认为价值观层面上的激进改变会自动带来一个新型社会,并把市场经济体系和代议制民主视为理所当然。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晚年的卡斯托里亚迪斯与其早期不同,受到了国际(和希腊的)既存机构及其大众媒体的广泛称赞,而任何真正的革命家几乎从未从精英集团那里得到如此的(否定性)“荣誉”。

2. 社会生态学、公社主义、自由进步市镇主义

如同上述,包容性民主理论和自治方案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哲学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区别,同样地,包容性民主与自由进步市镇主义之间也存在着重大差别。包容性民主,尤其是其经济民主所建议的摆脱当前危机的措施,既不同于建立在真实市场基础上的工人委员会(卡斯托里亚迪斯早期),也不同于建立在后稀缺基础上的“道德经济”(布克金)。

如同与自治方案的区别一样,包容性民主同自由进步市镇主义之间的区别也是在哲学和经

济层面上的。在哲学层面上,正如笔者在《走向包容性民主》中所阐明的,一个民主社会的方案既不能建立在社会变化的进化过程基础之上,也不能建立在技术的(例如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或非技术的(例如布克金的辩证自然主义)(Bookchin, 1995)基础之上。尽管辩证自然主义被明确地称为自然和社会进化的非技术观,但它依然假定了一个通向民主生态社会的“方向性”——这一社会恐怕由于“偶然”情况永远无法实现。因此,布克金在明确承认社会进化与有机进化极为不同之后,将社会变革描述为一个进步的过程,定义为“人类历史活动和文明的自我定向,趋向渐增的理性与自由”(1995: xii)。然而,如果说关于自然进化的理性过程的假设是无根据的,那么在笔者看来,关于存在社会进化的理性过程的假设是根本站不住脚和令人厌恶的,因为这一观点将历史看做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是理性的伸展,认为存在通向自治或民主形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进化(Fotopoulos, 1997: 328-340)。当然,人类历史的事实并不支持关于人类进步的重要进化范式,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过分强调“社会想象”的作用(卡斯托里亚迪斯的术语)而忽视“系统性的”因素,如上所述,这样很容易导致对历史的严重误读。

由于上述原因,包容性民主的历史观既不采用依赖于对自然或社会变迁的具体解读的大进化范式,也不使用走向另一极端的方法,即夸大人类历史中(主观的)想象因素的作用,而低估“系统性的”(或“客观的”)因素的影响,最终导致对历史的严重误读。相反,包容性民主方法试图保持“主观”和“客观”因素之间的平衡,将人类历史视为创造性人类行动和现存制度框架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即由于“想象的”和“系统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其结果总是不可预见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民主社会被视为他律性社会所建立的历史连续性的中断或断裂。

然而,布克金的进化视角对自由的物质前提条件的存在和民主概念本身有着重要的意蕴,使得经济民主的概念变得多余。布克金假定,进步过程已经导向了“后稀缺社会的门槛”,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供了可以为自由提供物质基础的丰裕技术”(1974:12),因而他并未看到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对经济民主的需求。相应地,布克金的民主概念主要是基于政治领域,经济民主不属于社会生态学的民主观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自由进步市镇主义使用了“后稀缺社会”的构想,其中不需要作出资源分配方面的经济决定,所需要的只是一些分享的指导性道德原则(Biehl,1998:chapters 10 and 12)。这就是为什么与自治方案、参与型经济和包容性民主计划相比,自由进步市镇主义方案没有提出关于资源分配的任何机制,而布克金本人也坚持认为,在一个公社主义的后稀缺社会中,“经济这个概念已被伦理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所取代,劳动车间、普鲁东合约、罗尔斯的正义等已经变得无关紧要”(2003)。

另外,从社会生态学的民主社会观中还可以得出一个关键性的负面暗示:它间接地预设了自由的物质前提条件的存在。通向自由之路取决于“客观的”因素,类似某种神话般的物质充裕状态的实现。但是,地球上所有人口的物质充裕的实现需要足够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至少会令人质疑,没有对环境的严重影响能否达到这样的阶段——当然,除非“物质充裕”是以民主的、与生态平衡相一致的方式界定的。更为重要的是,后稀缺社会的公社主义阶段事实上是一种神话般阶段,因为它预设了需求和稀缺的“客观性”定义。可是,即使有可能客观地界定人们的基本需求,也绝对不可能客观地界定各种满足物(satisfiers),即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更不用说在今天的发达社会中日益重要的非基本需求了。所以,后稀缺社会的实现不只是财富重新分配的问题,

因为许多自由进步主义者和社会生态学家想当然地认为,“后稀缺社会……尚未实现,不是因为技术是不道德的,而是因为使用技术的社会制度是不道德的”(Biehl,1998:98)。

相比之下,在包容性民主理论中,后稀缺社会和自由的实现之间是分离的。稀缺的消除,以及由此带来的分工的消除,对民主而言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因此,人类从必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王国与经济过程是分离的,尽管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和马克思,再到阿伦特和布克金都认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区分是根本性的。但是,尽管在对人类活动作区分时这种分别也许是有用的概念工具,但在社会现实中这两个领域必须被视为相互排斥是毫无道理的。无论如何,历史上曾有过几次不同程度的自由在以“必然王国”为特征的情况下存在过的情况。另外,当我们不再将二者视为相互对立时,就再没有任何为了进入自由王国而企图支配自然的正当理由——而对自然的支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重要因素。

所以,包容性民主观念既没有任何实现自由的必需物质前提,也没有像深生态学和其他唯心主义运动主张的那样,需要通过接受某些精神教条来实现大规模意识变革的通向自由王国的入口。可见,包容性民主是比通常的自由进步主义的未来社会(布克金和其他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更宽泛的概念,后者是以直接民主和后稀缺社会的市镇化“道德经济”为基础的。这不仅是因为包容性民主涵盖了由邦联化社区大会作出的重要政治经济决定,以及由劳工、教育机构大会作出的具体性决定,更为关键的是,包容性民主制下的经济决定涉及关于稀缺资源的配置,而不是像社会生态学家坚持认为的那样主要涉及的是由机器完成大部分工作的行政管理性决定。

上述表明,任何自由主义的计划要想更现实些,而不是停留于空想,就必须包含制度方面的

理论想象,从而使稀缺社会背景下的民主决策成为可能。因此,对于一个切实的解放性计划来说,仅仅诉诸于道德经济如何能够自动解决后稀缺社会面临的所有经济问题的主观设想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如果对目前普遍化的市场经济社会组织形式的一种替代性计划,是为了激励现在道德退化的人们,那么,这种替代性社会的可行性就必须得到清晰阐述。这意味着,在一个致力于满足所有公民的基本和非基本需求的新社会中,与稀缺资源分配相关的关键性问题必须首先在理论上,而后在生活实践中,在经济民主的框架下得以解决,而经济民主需要此时此地就开始由新的大众性反体系运动来建构——这正是包容性民主的转型战略所反复强调的。

3.参与型经济

随着对于建立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可能性的广泛疑虑,思考后资本主义社会应采取的具体形式已变得异常紧迫。迈克尔·艾尔伯特(Michael Albert)和罗伯特·哈内尔(Robert Hahnel)对于参与型经济的“展望”,以及由他们和其他人提出的关于相应政治制度的补充是沿着这个方向的努力。但正如笔者在他处表明的(2003),尽管这一模式代表了目前从社会主义计划及其历史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最好努力,却并不能确保创造一种新社会组织的制度条件——重新整合社会、经济、政治和自然。

最初,参与型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方案、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自治方案以及包容性民主方案相比,并不是一个完全成型政治方案,而主要是一个狭隘的经济替代模式。最近,或许是针对包容性民主批评其在政治制度上的沉默,以及其他类似的理论批评,参与型经济又作了一些修改补充,增加了与参与型经济相一致的政治内容,或称之为“参与型民主”。

所以,参与型经济缺乏任何政治的、历史的或哲学的分析作为支撑,而只是依赖于作者对现

存体系某些因素的排斥,以及他从“大量积极分子的不懈努力所蕴含的志向和洞察力”中得出的一些价值观(Albert,2003:13)。也就是说,参与型经济未能在历史辩证法或自然辩证法或自治和他律传统之间进行抉择的基础上,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提供正当辩护。但是,一个关于未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严肃方案,不能只是一些知识分子的想象物,以及从社会斗争中概括出的价值观。这些方案要想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政治计划,就必须自觉整合进左翼历史传统,从对现存社会及其各种趋势的系统分析中得出未来社会的组织原则。依此而言,反体系的左翼不需要借用所谓的多元主义视角,后者只能服务于当前盛行的后现代意识形态大杂烩,作为其主张的“可能的替代性世界”意识形态外表。

艾尔伯特明确地宣称,他的模式包含社会主义的或直接民主的价值观,并将其概括为“无政府主义的经济观”。然而,尽管参与型经济也讨论工人委员会,但却不能划归社会主义的传统。此外,关键性的转型战略和革命议题也都被回避,而是采用了“世界社会论坛”的改良主义反全球化战略。当然,参与型经济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因为它所探讨的上述“视点”不包含任何对当前社会的历史分析。参与型经济既没有借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定义,也没有具体阐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所采取的形式,以尽力动员左翼的大多数。

同时,参与型经济也不能划归为自由进步主义或自治民主的传统,因为它的集体决策机构是明确限制在经济领域中的。所以,在最初的参与型经济范式中,公民概念是明显缺失的,被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概念所取代——由此将资本主义社会造就的、现代人的经济二元主义引入它所设想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而且接受了目前对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二元划分。参与型经济之所以以扭曲的直接民主观而告终,正如笔者在他处力图

证明的(2004),完全是它自己造成的。

尽管如此,为了描述与参与型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制度(Shalom,2005),公民概念后来还是被引入进来,虽然只是作为作出重要决策的劳动者和消费者概念的补充。依据这一计划,消费者委员会(即现在的“大众委员会”或者“委员会”)负责政治决策,相应地,消费者就是现在的“公民”,可以进行政治决策,而不是作为消费者委员会成员只能进行关于分配的纯经济决策。

社会中还有初级委员会便以吸纳每一个成年人,这些初级委员会的成员数量大概在25~50之间。每一个初级委员会都会选出代表参加二级委员会,每个二级委员会大概由25~50位代表组成,可能和初级委员会规模差不多。同样地,每个二级委员会会选出代表参加三级委员会。依此类推,直到全社会有一个最高委员会。

但是,该方案中的立法体系不仅将某种“官僚化民主”制度化[难怪参与型经济被约翰·克伦普(John Crump)恰当地称为“参与型官僚政治”],而且是高度等级化的。因为,委员会的“代表”“要尽力代表选举他的委员会的真正意见”,否则他们将不会被“授权”。不难想象,每一个高一级的委员会的成员都比低一级的成员集中更多权力,并在最高委员会中达到顶点,结果最高委员会将扮演一种立法的中央委员会的角色。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最终原因,当然与参与型经济是基于集权的经济和社会的事实相关,这与包容性民主所预想的根本上分散的经济和社会形成鲜明对照。

相比之下,在一种真正包容性的民主中,所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决议都是直接由公众大会中的公民作出的,这是最高决策机构。无论何时,需要进行高一级的决策(地区的、邦联的)时,是有着具体授权的可召回代表大会来协调地方决策,管理者在地区或邦联层面上执行决议,这意味着地区和邦联大会完全是行政委员会,而不是像所有代议机构那样的决策机构。

因此,很明显,艾尔伯特(还有哈贝马斯,以及其他“市民社会”方案的支持者)不是将直接民主视为一种制度,而完全是一种程序,因而,它已经被其对立面即代议制所取代。实际上,直接民主是与参与型经济的处方不相容的!尤其是参与型经济采取了一种“工具主义的”政治概念,即人们参与决策的程度与决策可能影响其的程度相一致;换句话说,他们参与决策的过程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当然,这与现存社会的政治观念相似,人们参与政治完全是为了增加个人福利,而不是出于政治生活的内在准则,比如自由、公平、正义、团结、无畏和卓越。

参与型经济与包容性民主的另一重要区别是,后者依据它所区分的基本和非基本需求,提出了基本需求的“按需分配”和非基本需求的“按劳分配”的互补原则。这样,它就明确承认满足基本需求是对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基本人权,只要这个人完成了符合要求的最小量的工作。而在参与型经济中,这种需求的满足交给了少量的公共供给和怜悯。

参与型经济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依据“工作复合体”而定的工作组织,作为万能处方以确保平等授权和平等的工作需要。但正如笔者在他处所说的(2003),在一个技术变革带来高度工作分化的现代经济里,不仅工作复合体本身必然有着有限的能力,而且它们对于授权和工作需要的作用也是值得怀疑的。艾尔伯特和哈内尔似乎认为,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是等级制分工的唯一原因,但实际上,后者的最终原因是公民之间制度化的权力不平等分配。尽管脑体力劳动分工对等级制分工的确有重要的影响,但如果认为这是唯一原因,那就太简单化了。因此,包容性民主所确保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平等分配的制度,是废除等级制分工的关键一步。但是,这些制度不仅应当包括决策大会,而且应该包括废除在工作场所、教育场所等地的任何法律上的等级制

分工——这就是包容性民主所说的社会领域的民主。

由于参与型经济将生态问题视为外在性的(就像正统经济学家和环境主义者那样),且认为可以通过增加消费者委员会而不是公共消费建议发起之处来解决。这样,生态问题事实上就被降低为次要的了,如同污染所引起的问题一样,后面这些问题确实可以通过所提出的程序加以考虑。但是,重大的生态问题比如温室效应,由于其解决需要公民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因而必须放弃将经济增长视为生产最主要的目标。此外,参与型经济在激进分权要求上的沉默,表明市场和集中计划经济都以集权为特征——这是一个导致目前生态危机的基本原因,而在参与型经济看来甚至根本不是问题!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与包容性民主不同,参与型经济完全依赖于资源配置的计划,这意味着除了它不区分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之外,参与型经济不能保证劳动者或工人的自我管理。事实上,没有一个只建立在计划之上的经济组织,能保证真正的自我管理和选择自由。

4.“去增长”与生态村

正如笔者已在他处指出的(2007)^①,由塞奇·拉陶彻(Serge Latouche)构建的“去增长”方案,出现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将全球气候变化与人为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明确相联系,并使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成为头版新闻。这一方案代表了绿色政治与思想的重大发展,因为这表明,作为一种反体系运动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绿色运动,在其主流成为一种改良主义左翼政党或游说团体而融入主流政治之后,它依然可以在改良主义的和反体系的运动之间发挥某种作用。

“去增长”方案在理论和战略层面上都显示了与泰德·特伦纳(Ted Trainer)所提出的“更简单的方式”方法的极大相似性。后者与前者一样,

意味着“通常是小规模、高度自足的地方经济;社会控制的而不是市场动力或利润动机驱动的经济体系以及高度合作的和参与性的体制”,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态村运动”(2007)。^②然而,“去增长”方案强调,过渡过程不仅包括主要在主体社会之外的“生态村”的建立,还包括“城市村”的建立(Homs,2007),后者涉及主体社会本身中高度的分权化发展。也就是说,生态村的支持者所渴望的主要是基于社会之外的社区基础上的运动,尽管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种新的社会运动,而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但与他们不同的是,“去增长”方案的支持者明确地将目标定位于在主流社会内部创造新的社会运动——正如传统绿党一直试图做的那样。

“去增长”方案的基本原则是我们所熟知的激进绿色的。为了增长而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已逼近生物圈的极限。尽管我们在生态效率方面有所改进,但它们又被增长所抵消。结果,带来灾难性气候变化威胁的生态危机,尤其是温室效应,仍在恶化。现已充分表明的是,持续的扩展是以牺牲生活质量为代价的——首先是动物,然后就逐渐是人类本身。因此,从减小经济规模的角度看,“去增长”似乎是必然和需要的。

然而,尽管“去增长”方案被其支持者视为“一种政治方案,涉及南北方国家和社会各个层面的重建,而且不会自动通过职业政治家的决策来实现”(Latouche,2007),但明显的是,它集中于当前多维度危机的一个方面:生态方面。尽管生态危机是多维度危机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其他方面也同样重要。换句话说,与包容性民主理论不同,“去增长”方案不是人类解放的普遍性方

^①see also the debate on de-growth in the same issue with articles by Serge Latouche and others.

^②see also the dialogue on ecovillage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 2/3 (June 2006).

案,而只是针对单一议题的。拉陶彻由此表现出的对普世主义方案的怀疑,很可能来自后现代主义者对任何普世主义方案的厌恶,同样,这种厌恶还导致大多数左翼放弃任何关于系统变化的论点,走向被卡斯托里亚迪斯指称的“普遍的盲从主义”。“去增长”和包容性民主方案之间除了上述基本区别外,还在理论和战略层面上存在着差别,尽管二者的确也存在着重要的相似性,比如在经济活动尤其是生产的主要目标方面,二者都主张远离目前的增长经济和社会,并通过激进的分权和地方主义来实现。

市场/增长经济和经济权力的集中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意味着在现存的市场经济国际化制度框架下,经济权力集中和增长经济的生态影响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去增长”方案似乎并没有拒绝市场经济体系或其政治补充代议制“民主”,这就意味着它所构想的文化革命并不预示着系统性的变化,而只是“想象的去殖民化”,即价值观和观念的变化。实际上,即使是谈论法律体系和生产关系的制度性变化,也没有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和资源在市场配置中的改变。

尽管如此,当拉陶彻主张“地方民主倡议[尤其是包容性民主理论提出、并由他本人详加论证的邦联化城邦(2003)]比一个民主的世界政府要现实得多”时,他还是对的。不过,地方主义,无论是采用城市村庄和参与型民主的形式,还是在改良的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下的邦联化城邦形式,都不会导向一个“去增长”社会。这是因为,这种“生态民主”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的问题,而后者正是目前多维度危机的根源所在。

同样的看法适用于泰德·特伦纳的“更简单方式”。它意味着“不太富裕(但充足)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多是小规模的、高度自足的地方经济”,主要是通过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深刻变革,来远离西方文化中的某些最根本元素,尤其是那些与竞

争的、贪得的个人主义相关联的因素。特伦纳认为,“我们最好的机会就是此时此地起,尝试将现有的城镇和郊区转变为某种‘生态村’”。在他看来,这一转变过程现在就可以开始,途径是小规模的地方团体逐渐地控制它们自己的地方经济。他总结说,这可以通过不与资本主义发生冲突来实现:“更简单方式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死亡,但我们战胜它的方式是对其置之不理任其死亡,远离它,和建造那些现在就已比较容易做到的替代性选择的组件。”(2006)

但正如笔者对这一观点所回应的(2006),只有当预示着这种新体系的现存反体系活动成为一种反体系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时,它们才能成为我们所面临的关键性难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这样一种过程不仅要求生态村的建立(主要在主体社会之外),还需要建立地方的“运行中的包容性民主”,后者可以逐渐将资源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分离出来,并创造新的政治、经济和生态制度来取代旧有制度。也就是说,转型过程的核心肯定涉及地方层面上的制度转变,并与价值观的转变相互作用,从而产生新的文化,而不是像特伦纳所主张的,整个过程可以简单地被激进的、与任何制度变化无关的文化变革所决定。

因此,依据包容性民主方案,只有通过旨在创造新的民主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通过公民教育以培养新型价值观的转型战略,我们才有希望为不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之上的经济和社会的出现创造条件,这将是一种真正的生态民主,并作为包容性民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五)需要一种全新的转型战略

正如前文所强调的,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反体系运动和阶级政治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不再有“体系”以及相应的“阶级区分”了;相反,它只是表明,我们今天面临着新的“阶级区分”,因而我们需要发起一种新型的反体系运动。

尽管谈论单一性的阶级区分不再有意义,但这并没有排除一种可能性,即当从属性的团体发展出一种关于价值和制度的共同意识时——正是这些价值和制度创造与复制着权力不平等分配的结构,他们会团结起来,不再是为了反对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而是致力于反对等级制度框架及其卫道士。那些使从属性团体的成员团结在一种像包容性民主这样的自由解放方案周围的因素,是这些团体被各种形式权力排斥在外——这种排斥基于权力分配不平等,而后者是现存制度及其价值观的特征。

包容性民主概念的综合性特征及其对今日“阶级区分”的分析表明,它所设想的反体系运动与传统的反体系方案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并且提供了一种新的反体系运动概念。因此,包容性民主方案所设想的反体系运动,在追求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上,都根本区别于旧的改良主义运动。

包容性民主方案的转型战略的基本原则是,系统性的变革目标要求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与过去的断裂,而这就需要创建新的政治组织和致力于体系变革的新的全面的政治纲领,从而在大规模民众层面造就清晰的反体系意识。

然而,一种新文化——必须在转向包容性民主之前就成为社会支配性的,只能通过广泛的范围内建立相应的新政治和经济制度来实现。换句话说,只有通过行动建立起这样的制度,一种带有民主意识的大众政治运动才有可能。这样一种战略将为社会转型提供条件,既包括“主观的”——有助于发展新的民主意识,也包括“客观的”——建立新制度,从而为新的包容性民主提供基础。同时,这些新制度的建立将会切实救助那些与现存制度框架相关联的权力集中的受害者,尤其是帮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受害者解决其面临的问题。

因此,包容性民主战略的目标就是自下而上

建立“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大众基础”,即地方性包容性民主,然后它们会邦联化,并为新的、更大规模上的邦联制民主的建立创造条件。所以,包容性民主战略的关键因素是,在一定数量的人在特定区域内形成了“运行中的民主”的基础时,包容性民主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就要立即建立。显然,这样的战略意味着对解放主体(Fotopoulos, 2002b)的重新界定,以便考虑到导致今天新的阶级分化图景的系统性变化。同样,它也意味着对新型政治(而不是当代现实政治)和政治组织的需要,就像包容性民主方案所建议的那样(Fotopoulos, 2002b)。

[参考文献]

- Albert, M., 2003. *Parecon: Life After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2003.
- Arrighi, G., Hopkins, T. K., Wallerstein, I., 1989. *Antisystemic movements*. London: Verso.
- Biehl, J., 1998. *The Politics of Social Ecology: Libertarian Municipalism*. Montreal: Black Rose Press.
- Bookchin, M., 1974. *Post-Scarcity Anarchism*. London: Wildwood House.
- Bookchin, M., 1995.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Ecology*. Montreal: Black Rose.
- Bookchin, M., 2003. Comments on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ecology network gathering and the “Deep Social Ecology” of John Clark. *Democracy & Nature*, 3(3), 185.
- Castoriadis, C., 1996. *La Montée de l'insignifiance*. Paris: Seuil.
- Castoriadis, C., 1997. *World in Fragment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 Hobsbawm, E., 1992. The crisis of today's ideologies. *New Left Review*, 192(March-April).
- Homs, C., 2007. Localism and the city: The example of “urban village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 3(1).
- Fotopoulos, T., 1997. *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

cy.London/New York: Cassell/Continuum.

Fotopoulos, T., 1999a. The first war of the internationalised market economy. *Democracy & Nature*, 5 (2) , 357-383.

Fotopoulos, T., 1999b. On a distorted view of the inclusive democracy project. *Democracy & Nature*, 5(1).

Fotopoulos, T., 2001. Globalisation, the reformist Left and the anti-globalisation "movement". *Democracy & Nature*, 7 (2).

Fotopoulos, T., 2002a. Towards a democratic liberatory ethics. *Democracy & Nature*, 8(3).

Fotopoulos, T., 2002b. Transitional strategies and the inclusive democracy project. *Democracy & Nature*, 8(1).

Fotopoulos, T., 2003. Inclusive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ory economics. *Democracy & Nature*, (November).

Fotopoulos, T., 2004. Chomsky's Capitalism, Albert's Post-capitalism and Inclusive Democracy (in Greek). Athens: Gordios.

Fotopoulos, T., 2005. The Multidimensional Crisis and Inclusive Democracy. Lond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

clusive Democracy.

Fotopoulos, T., 2006. Is the eco-village movement a solution or part of the proble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 2(3).

Fotopoulos, T., 2007. Is de-growth compatible with a market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 3(1).

Latouche, S., 2003. Will the West actually be happier with less? The world downscaled. *Le Monde Diplomatique*, (December).

Latouche, S., 2007. Degrowth: An electoral stak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 3(1).

Shalom, S.R., 2005. ParPolity: Political vision for a good society. *Z Magazine/ZNet*, (November).

Trainer, T., 2006. On eco-villages and the transi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 2(3).

Trainer, T., 2007. Renewable energy: No solution for consumer societ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 3(1).

责任编辑:胡颖峰